

博羅文史

1968



聯合抗戰學院近代史資料研究室
資料室

(二)



44128/16

博 罗 文 史

第 二 期

赠 阅

博罗政协文史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

目 录

中共博罗县委在抗日烽火中诞生

..... 县党史办同志访问李健行记录稿 黄善仁整理 (1)

博罗洪门会.....林道行供稿 黄松源整理 (6)

辛亥革命后博罗女学的发展

..... 韩美馨初稿 韩绍兴整理 (12)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期间博罗文化

教育片断.....林道行 (17)

抗战初期博罗的抗日宣传工作.....张绍辉 (34)

一支开赴抗日前线的民兵.....林道行 (40)

陈洁先生传略.....黄惊白 (44)

名山·名上·名寺观.....余昌稿信 黄松源整理 (51)

编钟——我县出土文物的瑰宝.....李广文 (56)

博罗公廨话沧桑.....韩绍兴 (59)

烂脚庙.....许全 刘杨太口述 赖水养 整理 (64)

领导七女湖起义的邓子瑜事略

.....曾郁培稿 曾蕃光整理 (67)

林森游罗浮.....张绍辉 (70)

王瑞祺竞选和当选县长前后.....远源 (72)

后记.....编辑部 (77)

封面设计 张伟烈

封面题字 彭天锡

165

中共博罗县委在抗日烽火中诞生

县党史办同志访问李健行记录稿 黄善仁整理

博罗县成立第一届县委是一九三九年。这届县委成员大部分现在还健在。

据我所知，大革命失败后，所有党员、非党员干部都一度离开博罗，一直到抗战之前，博罗都没有党员。“七七”事变之后，南委（中共南方委员会，设在香港，周总理领导的）有人提出，想办法派人回博罗。当时国民党派黄仲榆去当县长。黄仲榆知道，如果日军在惠阳沿海登陆，博罗是前线，要在那地方当县长不容易。他是中山县人，原也不想当穷县当官，但刚好他有个侄子黄健在博罗，黄仲榆怕错过升官机会，因此便去就任。黄仲榆对其侄子说：没法找一班人建立县府。

黄健是抗战期间第一个去博罗的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抗日战争期间他在香港，把黄仲榆当博罗县长的事情报告南委，南委找到饶彰风同志，当时黄健搞国共合作，同饶讲了这么个关系，提出能否派些人回博罗与黄仲榆共事，饶派刘墉（大埔人，大革命时期入党的中共党员）与黄健一起回博罗。刘、黄均是大革命

失败后第一批到博罗开展党的工作的。这是一条线。

另一条线，大概是一九三七年底或一九三八年春，广东省委派党员干部麦刚（麦任）和王成同志（麦妻）去博罗黄麻陂找李志春同志，以后这条线的人住在黄麻陂，建立了工作据点。

据我所知，当时没有全县统一的党组织，两条线各自开展党的活动。黄健、刘墉住在县府，以职员身份为掩护。麦刚他们以小学教师身份为掩护。以后，黄健不知什么原因离开了博罗，但刘墉仍然留下。

此后，为了开展工作，党又陆续派人到博罗。其中有党员也有非党干部。一九三九年春，东团博罗队就通过刘墉同志关系来到博罗。团长梁永思，副团长李翼（杨德元）。同博罗队一起去的有李游子（后叛变被枪毙），洪劲持，还有吕宗平。博罗队去后不久，又另外有“港澳学生赈济会”这个十多个人的青年学生团体，也是通过刘墉关系来的。这个团体当时还无党员，都是青年，负责人是陈琪，还有一个负责人是女的，名字记不清了。

那时博罗建制分成四个区。博罗城、义和、附城、七汝湖、仍图属一区。石坝、埔前、麻陂、枪子、獭子、显村属二区。响水、湖镇属三区。长宁、福田、铁场、九潭、横河属四区。博罗队基本在县城和附城活动。二区区长谭家驹（地下党员），三区区长陈洁（国民党博罗县党部书记长，进步人士），四区

员刘志远(地下党员,是一九三八年春通过南委关系去博罗的)。当时二区有无党支部记不清楚。县城有党支部,刘墉同志负责。博罗队也有党支部。那时,博罗县有党员,有党支部,但仍没有全县统一的党组织。

一九三九年四月,东江特委派我去博罗。当时交给我四大任务:一是建立博罗县党的核心组织——博罗县委;二是建立武装,开展游击战争;三是发动群众,建立地方青年组织;四是利用黄仲榆关系,把国民党政权变为统一战线政权。(当时对黄仲榆估计比较高。开始时黄也言听计从)。特委派我去准备大搞,因为博罗是前线,国民党不敢去,不愿去,对我党开展工作有利。我于四月初旬到达博罗,五月中旬便正式成立县委。县委名单经特委提出、批准,县委书记是我,组织部长麦刚,宣传部长刘汝深(刘江风)统战部长刘墉,武装部长胡展光(后已牺牲)。青年委员先是李翼(杨德元;现任广东省副省长)后是韩继元(原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副校长)。

博罗县委成立后,我们的工作按照东江特委指示,根据博罗情况:第一,党的活动建立两线关系,我在第一线,半公开形式。麦刚负责第二线,秘密的。当时这样设想,如果第一线站不住而转移,便由第二线坚持。第一线的同志利用公开合法身份,不是在县政府工作,就是在东江华侨服务团工作。我和刘汝深(原任广州中医学院副院长)就是打着博罗队名

义工作的。刘塘、胡展光在国民党县政府工作，刘塘是县政府民政科长，胡展光是县政府军事科长。

第二线麦刚（麦任，曾任广州市政协副主席）与博罗队无关系，与县政权无关系，公开身份是黄麻陂小学教员。

第二，充分利用国民党县政府的有利条件，搞群众抗日武装斗争。为了实现这一任务，组织上派了不少人在国民党县政府工作：肖伟任一区区员兼巡官。刘志远任四区区员，谭家驹任二区区长。三区无我们的人，主要利用陈洁的社会地位和关系。由组织上派些同志去掌握情况。在国民党县政府内，还派了同志去理财，做黄仲榆的财神。此外，我们还派党员和青抗会骨干打进县政府其他部门。

我们利用合法地位在附城田牌办了游击训练班，作为将来建立武装队伍的军事骨干。为了办好这个班，当时特委派来了四个从延安回来的同志。这四位同志是谢阳光（曾任省机械厅副厅长），赵学（谢阳光妻，曾任省体委副主任）、郭大同（原省化工厅副厅长）、李成、（李镇静，原省化工厅副厅长），还临时调去县委秘书林志成（后变坏）。

第三，开展群众运动，在斗争中健全县委并建立党的区委，发展党的力量。

博罗队的活动原来在博罗城，县委成立之后，为了发动群众，分批下乡，在响水，新作塘、澜石、长

宁、公庄建立据点，扩大活动。另外港澳学生组织的“赈济会”，据点在湖镇、长宁和新作塘。

当时，县委设在响水塘下小学，我住在那里，林志成也住在塘下。刘汝深住在博罗队的响水分队，麦刚住在麻陂，胡展光、刘墉住在县城。县委设秘书、妇女干事、青年委员、交通员。青年委员杨德元（后由韩继元担任），妇女干事岑泳薇，专职县委交通员魏凌冲（魏洪涛，原省公安干校政治部主任），兼职县委交通员博罗队交通员薛贤亮。

区委的设置是：四区区委设在长宁菜园村，区委书记杨凡，住在澜石；宣传委员杨步尧，住在长宁；组织委员李冲，住在澜石。二区区委书记谭家驹住在显村。三区未设区委，主要靠博罗队部的梁永思，李翼在那里活动。公庄分队张漫天（张在一九四二年于河源牺牲）在那里活动。县城、新作塘、公庄、长宁的党员，多是这届县委发展的。如韩继元、李江都是这时先后入党的。

博 罗 洪 门 会

林道行供稿、黄松源整理

洪门会又名三点会，有数百年历史。在解放前它是博罗唯一的秘密会党组织，几乎全县都有它的会众，所以又是博罗家喻户晓的一种社会势力。但全县究竟有多少会众，谁也不晓得，大概连它的头目也不清楚。为什么呢？因为洪门不是单一的垂直的组织，即使同在一地区也常常自立山堂，各自结伙，没有统一的组织体制，没有明确的隶属关系。最好的情况是几个“义友”，（参加洪门的互相称“义友”或兄弟）例如七八个人给封个“母舅”，作为他们的小头目。每“放台”（举行集体入会仪式叫放台，十人以上入会就可放台，十人以下入会不能放台，只能个别“交宝”，叫做“变”）一次封“白扇”（相当于司爷或参谋）“洪棍”（相当于武装指挥员）和“草鞋”（相当于交通员）各一，但这些被封的人在洪门中只有个荣誉地位，并无多少实权。白扇和洪棍都有放台的资格，放台可以得到一些经济实惠，照惯例新参加会的人要向放台的“先生”奉送几十斤到几百斤不等的稻谷。象这样松散的组织自然不能有大规模的统

行动，象这样松散的组织自然难免良莠混杂，难免藏污纳垢。但是也不是什么人都可以进去或愿意进去就进去的，因为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它是秘密的也是非法的组织，这本身就具有限制性，有些宗族统治力强的地方，洪门就难于立足。愿意参加洪门的主要是两种人：一种是想利用这种社会势力，以求达到私人目的的人；另一种人是为了靠这种势力保护，求得不被别人欺压，出门不被抢劫，说不定还可希望占点便宜的人。后者占多数，因为义友之间有所谓“念”（即照顾的意思），他们严格区别“浮水货”（自己人）和“沉水货”（不是自己人），对自己人讲义气，有所谓“鸬鹚不食鸬鹚肉”。至于前一种人，为达到私人目的，一旦有了洪门这个依仗，往往铤而走险，为匪为盗，以求一逞。这种人在洪门中不占多数，但他们能量大，往往是洪门的骨干，所以洪门和“捞家”便结下不解之缘。当然在这种人中也包含不满现实，要求打破现状的；包含受人欺压，有冤无处申。想依靠洪门来报仇雪恨的人，而这样的人也是少数。

那么洪门这个松散的组织怎么能够存在散百年呢？

据洪门中人说，这个组织始自清初，明朝有一批忠臣，不愿臣服清朝，跑到河南少林寺，在那里成立了洪门会，以“反清复明”为宗旨。后为叛徒告密（传说叛徒名马义，洪门现在通称“反骨”的人为马

义)，遭到清军围攻，于是向南逃走，他们逃到南方，便把洪门的组织扩散到南方，扩散到民间。这是一种传说。这种传说虽然不完全可信，但也不全无根据。历史记载：天地会又称三合会、三点会。对内称洪门。创始于清康熙年间，政治上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盛行于东南沿海和长江流域各省。其主要成员是农民、手工业者和失业游民。曾多次发动反清斗争。太平天国起义后，它的成员一部分参加太平军，一部分在各地举行起义。辛亥革命时期成了资产阶级革命派进行武装斗争的主要力量。此后，这类团体往往为反动势力所操纵、日益没落。现在侨居南洋和美国的华人还有洪门堂的组织，曾参加过反清活动、参加过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的反清活动。但经过首期的历史变迁，“反清复明”的观念早已消失，不再是维系他们的观念、维系他们信念的就只剩下所谓义气了。

洪门义友之间虽然没有垂直的组织联系，但他们之间有很多隐语暗号（多到非久在其中活动的人不能尽晓）可供联系，通过隐语暗号可使他们互相认识。互相认识之后，就可以互相照“念”、可以互援互助。因此，隐语暗号又是维系他们的手段、使他们的活动范围无限扩大。洪门的隐语暗号是洪门这种秘密组织的最大特征、研究他们的隐语暗号可以窥见他们的风貌。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我党统一战线政策

的推动下，这个团体中的民族革命思想有所觉醒，对革命武装斗争亦起过一定的作用。公庄区官山乡大村围有一位黄梅先（原名黄开先），洪门会众都称他“先生”，他在博罗洪门中是个知名人物，抗日战争前他在惠阳淡水一带活动，日军侵占广州后，他带着妻子回到博罗，开始在博西活动，后来在博东北一带活动。一九四四年他的思想开始转向革命，曾先后三次主动去惠（阳）东（莞）宝（安）抗日前线，找到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司令部，请求派员去领导他们。东纵司令部曾答应他的请求，先后两次派人到他们的大本营——柏塘了解情况，进行工作。一九四五年一月，日军第四次侵占博罗城时，他曾集结六七十人枪，准备进驻柏塘圩，因慑于柏塘圩附近有国民党县政府及其警察中队驻守，加上缺乏军事指挥人员（洪棍本是武装指挥者，而实际上徒有虚名），于是在临战的严峻时刻动摇散去。嗣后在东江纵队派员帮助下，再次集结五十左右人枪，成立一个代号北平队的中队。中队长古汉彬，小队长张友义，隶属于东纵第五支队，参加过第一、二、三次公庄战役和柏塘保卫战。这个中队还单独在河源古岭伏击新丰县长，缴获长短枪十多支，队伍曾发展到六、七十人。后来编入第三支队，整编后由于受不住严峻的考验，大多数人离队回家，能坚持下来的只有五、六个人。

有一支活动在象头山和桂山之间的捞家队伍，人

枪约三十，首领邓子庭与黄梅先亦是有联系的，一九四五年一月，他通过黄梅先与东江纵队人员有过接触，对参加东江纵队的态度开始不明朗，但事后他却打着东江纵队第五支队的旗号，在东江河收税，被东江纵队缴了枪，后在东江纵队司令部受到革命教育，参加了东江纵队。邓本人参队后表现不坏，日本投降后，国民党重兵进攻博罗抗日根据地，东江纵队江北指挥部在桂山地区活动的部队，在情投交通方面得邓之助力不少，原来邓为“捞家”时安置在公路旁的茶亭耳目都变成了桂山部队的情报员。在解放战争时期邓子庭担任粤赣湘边纵队东三支第三团副团长。一九七八年病逝，晚节很好。

原公庄隘子村人李觉（原名李连兴）曾利用参加洪门的机缘拉起一支约廿人枪的队伍，参加了东江纵队在一九四五年六月进行的公庄保卫战。日本投降后与东江纵队派去的同志一起在公庄坚持斗争，一九四七年博罗恢复武装斗争后，他重新拉起队伍与国民党作战，他的这支队伍就是后来活跃在龙门地区的白虎大队。

黄梅先晚年及其联系的洪门会众，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下，民族意识有新的觉醒。抗日战争后期特别是解放战争时期，博罗的党组织又加强了对其头目和会众的争取和改造工作，直接派人打入洪门去，收到良好的效果：第一，把洪门的头

目和会众争取过来或者使之保持中立，不为国民党所利用；第二，维护了解放区游击区的革命秩序；第三，增强了人民的革命武装力量。当然也不应忘记，为了争取改造这种社会势力，人民方面也曾付出过血的代价，尹林丰烈士就是给洪门中的歹徒杀害的。至于黄梅先本人的表现呢？他很想以共产党员自居。曾向东纵工作人员口头提出入党的请求，但他并不真正了解共产党，他把洪门的义气和共产党员间的阶级友爱等同起来，把“劫富济贫”和当时的减租减息等同起来。平时讲话做事，江湖习气很重，这就妨碍了他的进步；加上当时年事已高，适应不了战斗频繁的环境。东纵北撤后在人民解放战争中他还做过一些对革命有益的工作。解放后在家乡逝世。

辛亥革命后博罗女学的发展

韩美馨初稿 韩绍兴整理

回溯清末废科举兴学堂时，博罗城仅在罗阳书院开办了一间小学，只收男生。民国成立后稍有发展，但女子教育仍极为落后。女子要进学堂时即使富家的女儿要读书，如不出县，也只能入学塾。据我所知，最早到外地读书的是在民国初年，县城镇的余美德、李白英，稍后有张洁梅，韩定如等去广州上学。余读至夏葛医学院，李读至韶关女子师范，张韩二人由白鹤洞真光女校读至国民大学。

博罗城创办女子学校始自一九一七年春间。当时县知事（县长）是新会人陈荣新。他热心教育事业，除原有的闾邑高等小学暨分校——城西初级小学外，再在城里增设了三间初级小学，同时在小东门街原净土庵开办了一间女校——称县立女子小学。这是博罗在历史上有正式女子教育的开始。校长是陈的亲戚赵蕙莲女士。据称是师范毕业生。教师有韩薰琴、韩华甫，二人都是经过省短期师范受训过的清代的秀才，课程中还有唱歌、体操；兼课教师韩维谦，是惠州中学毕业生。开办时学生有四、五十人，年龄都比较

大，有大至二十岁的。当开学那天，学生穿着整齐。县劝学所长，城里各校校长，商会长以及知名绅士都被邀到校参加开学典礼，陈知事亲临讲话，仪式很是隆重。女校的教学科目与其他学校相同，但多一科家政。采用的教材有女儿经、列女传。授课分高初两级，共两个班，用复式教学。

陈荣新在职大约只有一年，女校长赵蕙莲随着他去职离开了博罗，学校一时没有人主持，形同关闭。直至新知事李祖湘上任半年之后，劝学所长李弼予几经请示知事，李祖湘在一九一八年秋才把女校恢复。校址改在白衣庵，（小东门街原国民第四小学）从广州聘请张洁梅、韩定如二人回来博罗，以张洁梅任校长主持校务。聘请了闾邑小学教师谢闰民兼教国文，惠州中学教师李端谷兼教唱歌。学生不多，仍分高初两级，设两个班，用复式教学。因办学经费短缺，县设的地方教育经费管理委员会从学产收入和一些杂税拨充。但对学生仍照创办时一样，不收学费。教师张洁梅、韩定如二人，志在为家乡服务、培养后辈，薪给虽微薄，但从不计较，全心全力灌注在校务上。这样，学生逐期增加，显得很有起色。一九一九年孔圣诞节，学校举行了学生成绩展览会，展出的女红手工特别精采，琳琅满目，受到社会人士普遍赞赏。一九二〇年第一届高小毕业（韩庄敬、韩静修、韩汝娥、刘仕达、韩静恬等）几个学生，在张、韩两

位教师的鼓舞和帮助下出县升学。前三人后来分别在广州图强产科医学校，柔济高级护士学校、惠州女子师范毕业，都是有一技之长为社会服务，能自立不必依附男子生活的现代女性。这对博罗风气的开通，有一定的影响。

县立女校，虽则由于条件限制，发展不快，但景象仍极喜人。岂知一九二三年春陈炯明军队败回惠州，桂军刘震寰部尾随东上，战祸突临，博罗城竟受到如同明末清军陷城对那样的浩劫。这一所方兴未艾的女校转眼之间面目全非，破散不存了。博罗在不断的兵争纷扰下，经过较长的岁月，居民死散过半，留下来的也在水深火热风雨飘摇中生活，女子教育更无从谈起，直至国民政府成立后，一九二五秋第二次东征收复惠州，博罗秩序才安定下来，各种事业随着渐次恢复。

一九二六年博罗开始创办第一间初级中学时，招生是否男女兼收？主事的人却意见分歧，有几位老学究坚决主张不招收女生，几经争辩，迟迟不能解决。嗣经有几个女生出来呼吁，奋力争取，并得到教界权威李端谷等的积极支持，最后才定案：男女兼招。出头奋争的女生就是前县立女小学生韩美馨，李美妍和韩汝娥。（这时她是在惠州师范读书）韩李二人考上了县中学。入学后二人平时成绩比较好，又有一定的活动能力，对女学发展有好的影响。那几年又经过革